

# 转折：1924—1926 年间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的兴起<sup>\*</sup>

罗志田

20 世纪中国史上有三次导致政权更迭的武装革命，次次都改变了历史。不过，在史家吕思勉看来，政权更迭虽“由于战之胜败，而战之胜败，初不在于胜败之时”。<sup>①</sup>这是读史有阅历之言。盖所谓偶然，其实多有其所以然，而突变往往也是积累所致。中国史学向有一派，主张知常才能知变。吕先生即以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sup>②</sup>言长程风化或许太久远，至少可以说，在山崩的前几年，风化现象往往由隐转显，揭示出胜负的转折。

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是三次革命中的第二次。十多年前，曾受命参与《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四卷的编写。该卷涵盖的时间是 1924—1926 年（止于当年的北伐）。其重点在梳理北伐前中国政治军事的变化，以为北伐的发生作铺垫。而其核心内容，则是北洋体系的崩溃与南方新势力（此所谓新势力，乃相对于当时常被称为“西南”的南方既存势力，详后）的兴起，而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与五卅事件为中转。<sup>③</sup>现在这一卷终于要出版了，对于北伐前这两三年的历史，个人还有些看法，期能就正于方家和同好。

## 一、关注历史进程的实际参与者

胡适曾回忆说，1923—1924 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成为中国“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sup>④</sup>如果他说的是 1923—1927 年的整个阶段，则北伐初步成功之后，国民党的重心地位开始凸显，大体不差。若将这几年分为两段，则在国民党改组初期，即使关心政治的国人，也并未太注意南方的变化；一般的舆

\* 本文初稿承汪朝光教授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波、薛刚、周月峰、高波、赵妍杰同学纠谬，谨致谢忱！

①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 页。

②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著史学与史籍》，第 23 页。

③ 这一卷的大纲，曾由罗志田于 1998 年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举办的座谈会上陈述，蒙与会的张存武、陈永发、吕芳上、许雪姬、杨翠华、张力、李达嘉、胡国台、张淑雅、余敏玲、朱浚源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的何高潮教授指教，获益匪浅，谨致谢忱！

④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 18 号，1932 年 9 月 18 日，第 11 页。

论,仍注目于北洋体系的发展演变。旋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毁掉了北洋体系的元气,新主政的段祺瑞和张作霖不得不将在广东重新开府的国民党视为重要力量而加以联络,并在1924年底邀请孙中山北上谈合作。外间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注意,多半自此始。

在此之后,直到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当时大多数关注政治的中国人来说,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对立,这也是那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然而,不少关于这一时段的既存中外研究,却多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仿佛20世纪20年代一直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在进行斗争。实际上,国民革命运动内部的国民党派系之争和国共之间的斗争,只是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后才引起外间关注,到1927年武汉与南昌及南京的对峙明显后逐渐广为人知;此前既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

这样看来,过去关于1924—1926年间的中国政治,多少都不免有些倒放电影的倾向。黎澍先生曾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中之一就是追随“国民党观点”表现为不从历史实际出发,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sup>①</sup>其实类似倾向在西方也多少存在(虽未必是有意要追随“国民党观点”),在民国史研究中尤其明显。<sup>②</sup>更广义地看,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都相对更注重研究和论证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简单一笔带过,或竟视而不见。这类倾向性在形成思维定式后,即使是最注重史料和讲究“客观”的史家,无意中受此影响,其重建出的史实反可能距原状更远。

上述研究倾向既可能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进化史观的影响,也可能受到“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不过,中国史学中早有不以政治竞争之胜负为叙述取舍标准的传统。观司马迁对“灭秦”这一政治鼎革中陈涉、项羽和刘邦的处置(刘、项皆出以“本纪”,而陈涉也以“世家”出之),可知他在承认竞争结果的同时,更重视的是历史进程中各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sup>③</sup>的确,历史上政治竞争的胜败是治史者研究和论述的对象,而不是其历史叙述的取舍标准;胜者固以其取胜而赢得在历史叙述中的一席之地,败者却不必因其败落而失去其在历史叙述中的地位。

在北伐前些年的历史参与者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中外许多著作忽视的力量,就是所谓“北洋体系”(包括文与武两方面);另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即外国在华势力,也多在外交层面受到关注,而其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则较少论及。实则国际关系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外部环境的转变,对国内政治也有直接间接的影响;遑论当时列强本有“太上政府”之称,其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向少踌躇,更不能存而不论。

这些方面近年可见明显的改善,惟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只有对北洋和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双方的心态、观念、行为及其互动有比较深入而接近原状的认识,我们才能对以北伐为表征的国民革命这一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转折有更为清晰的了解。而且,对失败的北洋军阀一方作深入的考察,予其以发言权,反可以对北伐如何发生、国民党何以能在短期内以弱胜强等问题得到更接近原状的认知。同时,对那一时段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介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程度,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认知。特别是当时的“外国”已不仅是通常

<sup>①</sup> 黎先生的原话是“不充分地研究材料,人云亦云,国民党反对立宪派,也跟着反对立宪派,以领袖划线,以党派划线,不从历史实际出发。”引自耿云志《回忆黎澍同志》,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sup>②</sup> 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sup>③</sup> 《史记》中列传的第一篇是几乎没有什么事功可言的伯夷、叔齐兄弟,更明确表出:是否纳入历史记载的标准,首先在于其所体现的历史意义,其次才是事功的表现。

所谓帝国主义列强,其构成更为复杂,而其影响和作用也与前不同(详后)。当时外国在华存在与中国内政的关联,仍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 二、北伐前南北势力的攻守势异

实际上,北伐前几年,南北双方都有较大幅度的内部整合,北方更有统一全国的尝试和努力。到北伐开始之时,南北的政治军事格局已与两三年前大不相同——南北对峙未变,而南与北皆不是此前的南、北了。在南北对峙的基本态势下,双方谁更能以一个整体或至少是一个整合性的力量出现,谁就更容易在竞争中取胜。北方当时具有法统的优势,是获得国际承认的政府,这既有利于权势的竞争,也承载着更多的责任。在向往统一的全面诉求中,北方显然背负着更强的社会压力。

因此,考察当时南北的攻守势异,仍须从当时的北京政治运作入手。在军人当政的时代,行政的变化、文武之间的关系及各类党派团体的具体政治活动,过去的通史相对较忽略;尤其是当年议会之中的政争,论者或以其“肮脏”、或以其受军人控制而无关大局,较少深入认真的探讨。然而老同盟会员马君武在北伐后感觉到“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的多多。”<sup>①</sup>

这是革命当事人的后见之明,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表面上固然是对暴力革命的反省,实际恐怕针对着暴力革命的后果,即国民党的党治新模式而反思过去。因为马氏进而提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补充说,民初贿选,至少还看重和承认议员“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

胡适自己也是同盟会时代就身与革命之人,北伐时且曾在英美两国高度赞扬国民党的军党一体化制度。<sup>②</sup>两位“老革命”对革命本身的反思,非常值得后之研究者深省。近年来,对于北京政治,特别是当年时人关心的法统、政制以及国会的演化,已有一些论述,尚不够细致深入。尤其当年的国会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甚至能否解决问题,仍很少涉及。而对实际执政的行政方面,即各部会具体怎样“执政”这一大领域,更基本未见论述。将来都还需要继续探讨。

进而言之,对于国民党改组,胡适一向予以肯定。他把国民党人所学的苏俄组织功夫,视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以来学到的第一项真本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sup>③</sup>按“国共合作”是这段历史不可不述的内容,中国大陆过去的研究,多从中共一方观察<sup>④</sup>;若注重历史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恐怕还当从国共两方面去看。胡适的见解,则提示着一个超出国共两党的视角。或可以说,苏俄不仅带来了新的“组织”方式,更引入一整套新型政治运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政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sup>⑤</sup>

在南方国民党正改组之时,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则体现了局势的重大逆转。1923年前,中

<sup>①</sup>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册,1929年4月26日,第402—403页。

<sup>②</sup>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8—286页。

<sup>③</sup> 参见胡适1926年11月9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演讲, Hu Shih,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No. 6 (1926), pp. 265—279.

<sup>④</sup> 参见李新主编、萧超然等编著《国民革命的兴起, 1923—1926》(《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sup>⑤</sup> 1925年北方关于联俄与仇俄的大争论,就是苏俄方式的冲击和影响已超越国共的一个表现。此事学术界尚乏深入的研究,原始材料多收入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上),由北新书局于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出版。

国外环境相对宽松,内战也少,且多发生在局部,电报战多于实际的拼杀,扰民较轻。第二次直奉战争就大不一样,作战形式从电报战发展到实际的恶战。不仅战争的规模扩大——动员的兵力是此前战争的数倍,而实际伤亡数量则达数十倍;在作战的方式上,从兵员、装备的运输,使用武器的种类到战术的运用,都呈现明显的“现代化”,特别是海、空军实际参与作战的程度为前所未有的。

但是,正因战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致使这些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遭受战争重创,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这对在法统上代表着中国(即得到外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并掌握着中央和多数地方政权的北洋体系非常不利。

假若大规模战争的结果是一方取胜,预示着此后的相对安宁,则主政者或可为战争的正当性申辩,而民众虽勉强然尚可能接受这一代价。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方进行武力统一的最后一次尝试,却未能产生出一个明确的赢家,这就意味着战乱的继续延长并可能进一步扩大,其自然的后果便是民心的不稳。吴佩孚督师北京之时,黄节曾赋《甲子中秋》一诗“云意深阴失月明,始知兵气满秋城。十年北客唯伤乱,双柝南街不断声。”<sup>①</sup>诗中实际描绘和隐喻兼具,表明士人已因当下致乱的“兵气”反思到十年来京城的不安宁。

北方武力统一的失败,提示出南北和平统一的可能,1925年的“善后会议”正可视为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以前对“善后会议”的研究明显受到后来国民党观念的影响(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其预设的负面评判常先于研究的结果,述及此事往往简单带过,认真具体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视其为南北和平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则“评判”或会不同。盖后之北伐不论具有多强的政治正当性,大型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终属“生灵涂炭”。借用马君武的话,解决于谈判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史家固不能自诩其所述为“千秋定评”,总宜多以其研究时段的人民为念,至少当尽量再现和平的可能性及各方为此付出的努力。

重要的是,“善后会议”所包容的政治力量越广泛,对时任执政的段祺瑞就越有利,故其希望会议成功的动机及其为此做出的让步,似均超出既存的认知。而孙中山以病危之躯携国民党众多要员长途跋涉,当然也不会仅仅为了“揭露”北京政府的缺乏诚意,实具有为人民争安宁的苦心。从现存阎锡山档案的大量文献看,其时段、孙妥协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遽然弃世,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一些人的个人态度也未必倾向于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终使这一和平努力未获成功。

狭而言之,“善后会议”也是直奉战争之后北洋体系内部进行非武力整合的最后努力;这次会议的失败,使中央政府在北洋体系内也逐渐丧失权威。五卅后出现的“反赤”倾向,一度给北洋体系提供了新的整合机会。在“反赤”旗帜之下,北方政治和军事皆曾有实际的整合尝试,但也基本未能成功。广而言之,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凸显出北洋体系在收拾政局方面已呈技穷之相,也使时人感觉到北京政府统治正当性的丧失。

杜牧曾说,“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房宫赋》)。中央政府渐失其应有的权威,中国政治权势的空缺遂日益明显。为填补这一权势空缺,各党派和各区域都有起而代之的愿望和努力。后来逐渐失势的青年党(亦称国家主义派)此时即非常活跃,然研究并不充分。其他党与派的活动就更少见述及了。而地方意识的兴起和中国政治的区域化,更是中央政府政治正当性丧失的一个逻辑结果。此前一度风行的联省自治余波未息,北伐前后“保境安民”口号的兴起,即是政治区域化的明显表征。这一走向与当时希望统一的强烈社会要求相辅相成,到北伐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

<sup>①</sup> 黄节《甲子中秋》转引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8页。

大体言, 1924—1926 年间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 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类似趋向也体现在北洋体系演化的地缘分布之上, 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促成直系垮台, 吴佩孚稍后复出, 却挽救不了直系的崩解; 段祺瑞虽出山, 皖系也未能再起; 北洋体系中原较边缘的西北各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应运而出, 一度颇能影响国是, 而后起的奉系和新兴的国民军渐成政治军事的大主角。北伐结束后还能长期存在的北方军事力量, 正是北洋系统内非正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三部分, 故后来的北方军事格局其实先已奠定。<sup>①</sup>

与此同时, 南方的局势也发生较大变化。杨荫杭在 1921 年曾对比南北双方, 认为北方“团结力稍强”。不过他也注意到, 从北方的发展趋势看, “袁之势力, 一裂而为皖、直; 直之势力, 再裂而为奉、直; 以后当更有分裂”。<sup>②</sup> 到 1925 年后, 南北在“团结力”方面出现了明显的颠倒: 北方的分裂确如杨氏所预测, 而南方则旧貌换新颜, 明显兴起了几个整合性的“新势力”。

所谓“南方新势力”的兴起, 主要指北伐前数年两广和湖南少壮势力的整合。此前与北方对峙的是老一代的南方势力, 亦即时人口中的“西南”(按那时的“西南”也包括两广, 不纯粹是个地理的称谓)。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 意味着国民党革命事业之孙中山时代的结束。经过一年多“后孙中山时期”的短暂过渡, 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琛)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了广东, 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 开启了蒋介石时代, 确立了以孙中山的少壮幕僚和亲属为核心的派系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领导地位。

从地缘角度看, 唐生智武装盘踞湘南,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 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 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结合, 复与湘南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 形成一个国民政府治下的数省势力范围, 提示出武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对久乱思安定的中国社会颇具吸引力。适逢北京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失道”现象, 反衬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 遂为后来北伐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到北伐时, 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 1924—1925 这两年崛起的, 北方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即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 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 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 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李济深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地位, 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 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知。若有人在 1923 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 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 而那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可以说, 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中国的军政格局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在国内政治局势逆转的同时, 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一个组成部分的外国在华势力的构成, 也发生了剧烈的演变。这一激变不仅使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具有根本性的变化, 还进而影响着中国的内部政争。

### 三、外部环境的转变与内外因素的纠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 也出现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现象, 其

<sup>①</sup> 另外两个崛起于此时并溃散在北伐期间的区域军事力量, 是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 和张宗昌在其半独立的鲁军基础上形成的直鲁联军。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 这一具有特定意义的“西北军”取代此前一般意义的“西北各军”(在那几年也一度相当活跃)的发展历程, 是最可探讨而研究尚不够深入的部分。

<sup>②</sup> 原刊 1921 年 3 月 12 日《申报》, 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44 页。

表征即原处西方边缘的美国与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入江昭(Akira Iriye)曾提出,一战的完结也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sup>①</sup>从思想视角看,威尔逊和列宁当时都主张民族自决(其具体涵义当然有不同),他们提倡的都是新观念,入江昭若指此而言,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则很不一样。在中国,正因为以条约体制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更多不体现在领土占有之上,其帝国主义象征原有一种“非正式”的特征<sup>②</sup>,则其“结束”在“正式”的帝国主义之后,固亦宜也。

实际上,西方早有所谓“中国特殊论”。入江昭即曾注意到,在欧洲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亚洲却可以联合贷款给中国,他把这一现象称为“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sup>③</sup>帝国主义列强一直有其特异的对华处事方式,并不完全遵照西方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故帝国主义即使在欧洲有所结束,也未曾迅速抵达中国。相反,对中国人来说,巴黎和会提示的不是帝国主义的结束,而是其继续存在。从认知的层面看,中国人心目中的帝国主义似乎还有加剧之势。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使中国的外部局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战争进行之中,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中方废除,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已经运作多年的“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实际上,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也确实推行着相对独立的中国政策,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sup>④</sup>

1921年5月,德国与中国在战后签订了平等的《中德协约》,这虽仅临时协定而非正式条约,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订的首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的一次。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两个条约都是通过基本平等的谈判所缔结,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德、苏两大国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以及苏联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

由于条约性质的关系,德、苏两国在北京外交使团中的地位已与前不同。更具象征性的是,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且因苏联派驻的是大使,而其他国家皆公使,理论上苏联应为外交使团首领。这样,驻华外交使团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已很难继续。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不复为一个整体,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努力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不过,当年中苏条约的谈判进程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苏俄代表加拉罕曾提出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这一违背国际外交谈判常规的口号<sup>⑤</sup>,却相当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

<sup>①</sup>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sup>②</sup> “非正式帝国主义”理论由 John A. Gallagher 和 Ronald Robinson 在 1953 年提出,参见其合作的论文“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815—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1 (1953), pp. 1—15. 关于这一理论的争论,参见 William R. Louis (ed.), *Imperialism: 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后来 Robinson 自己对此理论又有所发展,见其“The Ec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with or without Empire,”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67—289.

<sup>③</sup>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p. 88.

<sup>④</sup> 参见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pp. 20—2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2nd ed., 1980), pp. 105—107.

<sup>⑤</sup> 不仅苏俄有此出格主张,西方人在支持联省自治之说时,也有类似表述。杨荫杭就注意到“前有西人著论,谓今日北京政府不能为国人所信任,应由各国撤销承认。撤销之后,亦不承认南方政府。但承认中国之国民,以各省省议会代表。”原刊 1921 年 10 月 23 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 443 页。这样的特别处理方式,其实也是上述“中国特殊论”的一种表现。

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sup>①</sup>因此,中苏谈判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谈判进行中各方面的社会反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激进化已走得相当远,这样的世风必然影响到此后的政治运作。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上海的五卅事件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的规模,从参与的人数、波及的地域和持续的时间等方面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新事物也许是运动的方式,即政党组织正式参与,既“发动群众”,更在运动进行中实际维持参与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以保障运动的进行。从社会史角度重建各类“群众”怎样被动员,他们如何“运动”,特别是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平日的的生活及具体活动等,似尚未见令人满意的研究,可探索的余地尚广。<sup>②</sup>

在这次运动中,商人和边缘知识青年都非常活跃。这样一种政治参与者的更易,是以近代社会演变为基础的。类似情形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仍在延续,尤其边缘知识青年成为中国群众运动中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群众运动方式改变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将不得不随之改变。既然新型政治运作方式基本是从苏俄引进,能运用并改进苏俄方式者,便更适应这样的变化。<sup>③</sup>

同时,五卅事件和五卅运动所牵涉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外交涉及其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影响都极为广泛,既可见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迸发,也可见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性运用,而中外交涉的成败又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政治演变。

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劭、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了)。现在交涉是完全失败了,外交当局太饭桶,气人得很。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sup>④</sup>当时人所说的“共产党”,含义并不精确,常常是包括(或根本就是指)左派国民党人及苏俄在华的影响。张君劭和蒋百里等,在民族矛盾与其本派势力及观念发生冲突时,显然更多顾及其利益与观念,而梁启超作为一国之士,却不能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当时反对联俄的章太炎,其心态和见解与梁启超相近,他在给黄郛的信中说:“[孙]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斯固大谬。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以争取交涉的胜利。他最担心的,一是“当局藉交涉为延寿之计,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sup>⑤</sup>;二是“学子受赤化煽诱,不知专意对付英国,而好为无限制之论”。由于整个事件中上下未能一致,中外交涉进展不大,“徒伤无事之人,而赤化家乃得阴受金钱,真可恼亦可丑也”。<sup>⑥</sup>

章、梁两人都感到说不出口的“气人”和“可恼”之处,即明知五卅事件引起的群众运动中有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努力,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因此运动而得势,但作为“国土”,在中外矛盾之前只有

① 参见何艳艳《“国民外交”背景下的1923—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龚红玉的未刊论文稍微涉及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参见其《上海民众在五卅运动中的具体活动述略》,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系,2003年5月。

③ “适者生存”的法则很快在稍后的北伐中得到体现,国民党显然比北方更适应新的政治运作方式。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台北《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④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5年7月10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8页。

⑤ 《章太炎致黄郛》(1925年7月3日),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32—233页。并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26—227页。

⑥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8—779、794—795、808—811页。

义不容辞地站在祖国一边说话,结果等于间接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至为复杂,章太炎最不欣赏的“赤俄”同样希望将中国的反帝运动引向“专对英人”的方向,故太炎对中外“赤化”力量的无意识支持恐怕超出其所认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已看出,若对外交涉不成功,“将来总是因此起内部变化”,亦即中外矛盾的缓解或激化都可能引起中国内部政争的不同变化。

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方面的无力表现再次凸显了其难以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给试图填补权势空缺的各政治派别提供了机会。本来中国民族主义就有对外抗议和民族国家建构的两面性,一旦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新兴的群众运动方式相结合(这一结合可以是但不必是人为推动的),又恰遇上前述中国政治权势的明显空缺,三个因素的关联互动,将使中国政治运作方式产生极大的改变。而中国政治运作的变化本由从苏俄传承了政治动员和组织方式的国共两党所推动,它们显然表现出比北方更能适应变化了并仍在继续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情势。

这一发展趋势要稍后才变得明显,像梁启超那样能看到外交对内部政治影响的人尚少,更多的人此时看到也更关注的还是怎样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国共两党认为五卅事件的根源在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整体上确如章太炎所说,“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一向被认为不怎么反帝的胡适就提出,应“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一要求不仅是“极正当的”,“在理论上事实上”也都有必要,应尽快落实之。他认为全面修约不仅“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这部分因为“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是赞成的了”。<sup>①</sup>

胡适提到俄国恐怕是一种惯性思维,因为中苏条约一年前已经签订,此时“赞成”中国修订与他国之约正是苏俄反帝主张的一部分,然他表述的口吻则说明苏联政策和宣传的成功仍在继续。美国方面在五卅事件后确实有新表现,美国在华各教会团体及燕京大学全体教授都发表声明,指出解决中外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在美国国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helm E. Borah)于6月正式声明赞成尽快撤销治外法权。以传教士和教授为主的三百多在华美国人以署名电报和信函支持波拉,而汉口美国商会则对其声明提出抗议。波拉的反应是指出在华美国商会本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部分”,正是“目前中国动乱的真正原因之一”。<sup>②</sup>

可以看出,此时中国朝野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外关系的思考与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中外关系中存在不平等成分,并表示愿意修订之,但各国之间以及各国政府内部对怎样修订及修订的限度等,仍存较大的歧异。中国各政治力量及舆论界思想界对同类问题的观念歧异也不稍减,各方的共识大体上仅达到章太炎所说的“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至于怎样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则言人人殊。而中苏谈判时已出现的“国民外交”势头仍在增强,各社会团体和政治力量在中外关系方面的“参与意识”空前高涨。具体的中外交涉正是在这样纷歧的中外观念竞争下展开,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外交。<sup>③</sup>

① 胡适《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胡适全集》(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② 参见 Dorothy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pp. 20—28, 68—94; Warren I. Cohen, *The Chinese Connection: Roger S. Greene, Thomas W. Lamont, 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 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1—131; Marian C. McKenna, *Borah*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p. 233—234.

③ 曾在欧洲长期受教的国际法专家周鯨生,后来正式提出不按既存外交规则行事的“革命外交”口号,主张“利用民众势力”,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外交的“要诀”,认为“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周鯨生《革命的外交》,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1页),大致即是这一趋势的自然发展。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列强于 1925 年 9 月照会中国政府,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从 10 月到 12 月,关税会议通过以裁除厘金为条件给中国以关税自主后休会。次年 2 月复会讨论具体事宜仅一个多月,段祺瑞政府即被推翻,与其有关系的中国代表大半逃往租界,会议实际中止。后来虽有复会的尝试,但列强间并不能就具体条款达成一致,中国关税自主仍悬而未决。<sup>①</sup>

1926 年 1 月召开的法权会议面临着更为动荡的中国政局,而各国的态度也明显更消极,只有美国比较认真,向会议提交了 482 项涉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案例,英国只提出了很少的案例,日本则根本没有提交任何具体案例。会议决定 5 月间到中国各地调查司法情形,实际上调查委员们尚未出发,美国代表史注恩(Silas Strawn)已于 4 月 16 日基本根据美国的材料起草了一份报告纲要,后来委员会的决议报告即按此纲要写出,一向对外交条款斤斤计较的英、日外交官并未提出多少修改意见。报告更多是关于中国改革现状的建议,以此作为列强取消治外法权的前提。<sup>②</sup>

两次会议虽然未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却揭示了列强之间的明显歧异,从 1922 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以来列强间合作共同对付中国的局面已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治外法权”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挑战的严重性显然超过关税的不平等,当时中国朝野却相对更重视牵涉到直接和实际利益的关税会议;而列强明显更愿意在关税方面做出让步,对于治外法权的放弃则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双方所重视的方面虽相反,其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则相同。北伐结束后中外很快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而法权问题则延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得到解决,亦良有以也。

同时,中国内政的不稳定,也是导致会议流产的重要因素。顾维钧稍后指出“对外交涉,固特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不一之故。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sup>③</sup>顾氏自己也“心实怀疑”一点尤其说明当时谈判的难度,中国之外交官恐怕也只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继续努力而已。

当时中国实际存在两个政府,而各自均与不同的外国有着疏密不等的关系。从中苏条约、五卅事件到关税、法权会议,处处可见内政与外力的纠结与互动,最能体现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苏俄在中国尤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不仅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在冯玉祥的北京政变、郭松龄反奉等影响重大的事件中,都有苏俄活动的踪迹。简言之,这一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南北的内部整合与南北之争都与国际关系纠结互动。

1926 年广东的“中山舰事件”,就远非仅是过去着墨甚多的国共之争,恐怕更多反映的是国民党自身的新陈代谢,同时也与国际冲突直接相关。当时广东的权势竞争波谲云诡,既包括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而各类“土客矛盾”更相当严重。从英、俄两国到众多“客军”等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彼此相互缠斗,复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成分竞争。地方意识和国际冲突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至为错综复杂。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权势争夺的表述却往往回避实质性内容,而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

<sup>①</sup> 参见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chapter 6; Thomas Etzold, “In Search of Sovereignty: The Unequal Treat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25—1930,” in F. Gilbert Chan and Etzold (eds.), *China in the 1920s: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67), pp. 176—231.

<sup>②</sup> 参见 Strawn to Kellogg, May 12, 1926, the John V. A. MacMurray Papers, the Seele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Wesley R. Fishel,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2), p. 112;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chapter 8.

<sup>③</sup> 《顾维钧致张作霖等电报》(1926 年 11 月 9 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 5 卷,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6 页。

念,是为当日政治运作的特色,最能反映内外因素的纠结。<sup>①</sup>

#### 四、余 论

上述政治参与者的更易、苏俄新型政治运作方式的引进及其所带动的政治运作方式的变化,均为影响此后许多年中国政治行为的要素,也是理解国民革命何以能够得到支持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得到多少支持的重要面相。而内政与外力的互动,更是那些年中国政治的典型特色。不过,这些政治史素所关注者,都只是政治的外在表现。而当时的社会变迁、集体心态和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演变,其实也都与政治活动关系密切。

以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对20世纪20年代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我们的认识仍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最多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尤其一般老百姓在干什么及关心什么)、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都还相当不足。史事本相关相联,而撰述不能不有所侧重,今日所谓专题式研究,皆面临着类似的紧张。不过,真正的断代通史,或可考虑适当疏离于偏重政治、军事的素习。

昔章太炎论著史说,读“纪事本末比看编年体更简便”,因为“要紧的事,并不在事体大小;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就差了”。<sup>②</sup>这真是卓见!历史上“事”的重要与否,本不取决于其“大小”;且什么事“重要”,甚至事的“大小”本身,也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的人,其眼中的大小轻重,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同代的研究者,其视野中研究对象的大小轻重,也可能有较大的不同。所以至少相对而言,纪事愈多,则愈能兼顾事的大小轻重。

在读书人延续着“规国”素习的时代,有时非政治言说中的附带一语,却可能提示出观察政治的重要线索。顾颉刚在1922年曾说,“民国成立十一年,受的痛苦何等多,当时虽恨恨,待了几时又忘记了”。当时的民众“谈到政治、社会”并不面向未来,预测明年如何可比今年好,却总说“能够回复到民国初年袁世凯时代的样子就好了”。<sup>③</sup>这是一位专心致力于学术的读书人公开发表的言论,似未见有人出而反对,多少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过去一般都注意到,民国成立不几年,政局的发展就让读书人大感失望。然而,又几年后,竟然有人怀念“袁世凯时代”,至少揭示出读书人的对时局的观感呈现出急剧恶化的态势。

问题是这正是顾先生的老师胡适提倡好人政治和参与筹划好人政府的时候,其一个时代背景或即因为中国外交方面的专业人员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结果,这似乎意味着:一、外国可以通过谈判吐出一些既得利益;二、中国要收回权益,也不一定只能采取“人民外交”甚或“革命外交”的激烈手段。进而言之,将那些政治派别方面相对独立或清纯的技术型官员聚合起来走渐进改良之路,可能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个选择。

胡适的怀抱希望和顾颉刚的失望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前者展现出北京的文官政治中仍有积极努力的一面,而后者则反映出一种对政治当事人整体的不信任,可知当时的政局确实有些让人迷乱。但随着“好人政府”的昙花一现,聚集技术型文官这个选项也转瞬即逝。若从后见之明看,顾先生的失望或代表着更多读书人的观感。连“袁世凯时代”都成为相对美好的回忆,读书人的进

<sup>①</sup> 说详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sup>②</sup>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sup>③</sup>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第14页(文页)。

一步失望表明,文官政治固然有所努力,却既无力抵抗武人的干预,也未能表现出适应新的社会构成之灵活性。而上述苏俄的外交主张,却适应了当时的世风和土风,也为五卅运动所表现的新政治运作方式预作了思想准备。

前引胡适在 1925 年提出中国修约自会得到俄国赞成的下意识表述,很能代表当日士人的心态。时在清华学校主持教务的张彭春,便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而深感忧虑。他认为当时中国出现了国家民族的精神分裂,其表现即“一方面,年岁稍高的人都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一方面,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一方面主张用外交机关,承认已有的政府,缓缓进行;一方面鼓动国民救国,对内对外同时用力,以群众运动为工具,以赤俄为模范及后援。”<sup>①</sup>

张氏并不以政治为主要关怀,甚至连议政也少有,但他的私下观察非常敏锐。其所论主要涉及北方,却展现了全国范围里的权势转移。那时北方一般学者的亲近苏俄,其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既存认知。到当年 10 月,他已期盼着“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一个月后,他就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说的是冯玉祥政变后的政局,那时所谓“北方国民党”与南方的政策并不全同,但外人难以看出其差别)。再一个月后,他更感觉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sup>②</sup>

1924—1926 年见证了北洋体系的崩溃和南方新势力的兴起,这一南北军政格局的大转折,连顾颉刚和张彭春这样很少议政的读书人,也有相近的感受。实际上,过去不被看好的民初十年,国势尚安,故读书人得以多在非政治层面活动。可是这个时间不长,到 1922—1924 年的两次直奉战争,表明北洋体系自身已不能统一,遑论统一全国。国势既不佳,读书人也越来越关心政治。但趋新读书菁英既不能摆脱政治,又不能从坐而言发展到起而行的实际政治活动,只能让位于起而行之人<sup>③</sup>;而最能吸引边缘知识分子的国共两党,既适应了社会的变迁,又奉行着新兴的政治运作方式,乃应运而兴。

(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成都 610065)

(责任编辑:徐秀丽)

<sup>①</sup>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

<sup>②</sup> 张彭春《日程草案》,1925年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sup>③</sup> 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145页。